

李四光纪念馆——

铭记卓著功勋 传承治学精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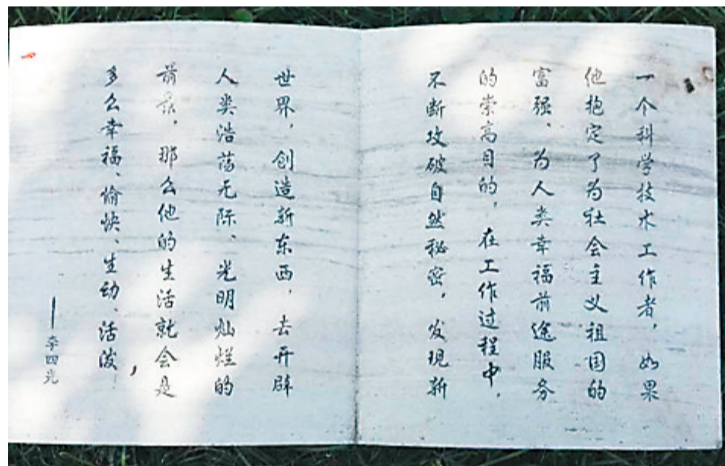
雷龚鸣 李泽岩 文/图



▲李四光旧居中的办公室

10月26日，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的诞辰。当天，笔者走进李四光纪念馆，参观了纪念李四光诞辰127周年展览，拜访了李四光先生的外孙女邹宗平女士。

邹宗平女士告诉笔者：“作为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之一，无论是创新地质理论、开拓地质力学，还是发展地质教育事业，李四光先生的奋斗都与国家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。”



▲李四光旧居庭院中的石书

努力向学 蔚为国用

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大学南路，一栋建筑被矮墙环绕，墙上垂下一簇簇爬山虎，显得十分清幽安静，这便是李四光纪念馆。

笔者了解到，李四光纪念馆原是李四光先生的旧居。李四光于1962年迁居至此，度过了1971年去世前的最后10年。1989年，李四光诞辰100周年时，其旧居被辟为李四光纪念馆，并由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先生题名。2015年，纪念馆经扩建、重新修缮后向公众开放。

“李四光纪念馆展览共分为四个部分：光辉足迹、卓越贡献、事业传承、精神永存。”邹宗平告诉笔者：“如同展览主题所讲述的，李四光先生从小便立下报国之志，从未有过改变。”

移步馆内，李四光的衣物和手稿，在海外留学时的成绩单、毕业证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的照片……一件件珍贵的藏品，还原了李四光当年辗转各国求学的场景。

谈及李四光的求学之路，邹宗平介绍说：“1904年，年仅15岁的他被选派到日本学习造船专业。1910年，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。1913年，又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。一年后，他认为采矿离不开勘探，便决定改学地质学；同时，选修了物理学、数学等课程，为日后的科学拓展储备了多学科知识。”

“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，尽快地贡献给我的祖国，这样更有意义。”带着报效国家的决心，1920年，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。从此，开始了在中国地质科学领域的探索和攀登。

严谨治学 力求真知

参观过程中，笔者注意到，展厅墙上有一张李四光一家人的全家福。除李四光是地质学院院士之外，其独生女李林是物理学院士，女婿邹承鲁是生物化学学院士，“一门三院士”为佳话。

走出李四光旧居，右面的一栋高楼，便是李四光于1956年亲自创办的地质力学研究

所。展厅中，铀矿石（仿制）、伽马仪、地应力监测设备等珍贵物品悉数展出。

“在探索地质科学过程中，李四光尤其注重野外实践。无论是在战争年代，还是养病期间，一个山头、一条沟谷、一堆石子、一排裂缝，他都从不放过，可见其治学之严谨。”邹宗平回忆道。

“1921年至1936年，李四光在北大任教，其中20多个学生，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地质学的院士。”邹宗平告诉笔者，“1952年8月，新中国地质部成立，李四光又责无旁贷出任首任部长。”

早在1922年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·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时，就写下《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》一文，给出了“中国贫油”的结论。

面对“洋权威”，20世纪50年代，在李四光的领导下，松辽平原、华北平原开展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，先后发现了大庆、胜利、大港、华北、江汉等油田，摘掉了“中国贫油”的帽子。

“无论是创立地质力学，还是确立中国存在‘第四纪冰川’，推进地震预报工作……勇于挑战权威，坚持自主探索，是李四光的精神实质所在。”邹宗平说。

“真理，哪怕只见到一线，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。”庭院中，李四光的至理名言格外醒目，这是他践行地质科学研究的写照。

教学科普 薪火相传

2009年9月，李四光被评为“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”，颁奖词评价他是“新中国地质事业群星中最明亮的一颗”。一个月后，10月4日，一颗遨游在浩瀚苍穹的小行星，被命名为“李四光星”。

“无论是组建行业学会，还是为武汉大学、长春地质学院、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等选址办学，这位地质学先驱一直致力于发展地质学教育事业。”邹宗平说，“新中国成立之时，从事地质学研究的只有290多人；到现在，已有将近1000万人，但还远远不够。作为李四光的后人，如今我们最关心的事，便是地质科学研究的传承和延续。”

在纪念李四光诞辰127周年展览举办当



▲李四光雕像

天，北京市近百名小学生、大学生到场观展。其中，花园村第二小学学生代表举行了“李四光爷爷我想对您说”主题队会活动。

“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、河川秀美。”花园村第二小学少年先锋队中队长长宣誓说，“‘吃水不忘挖井人’，我们要以李四光爷爷为榜样，弘扬科学、严谨的治学精神，勤奋好学，立志成才。”

笔者了解到，早在4月22日，为纪念第47个“世界地球日”，普及地质科学知识，国土资源部就举行了李四光纪念馆开放日暨《温家宝地质笔记》赠送活动。

对此，邹宗平表示，“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像地质学前辈们一样，勇于探索，加入到地质学研究的队伍中来。”

君臣情怀的美好追忆

每年中秋佳节前夜，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都特别举办“夜游武侯祠”活动。来自各界的市民提灯游走于古迹间，观汉昭烈庙、拜谒武侯祠、游翠竹红墙。这时，寂静肃穆的武侯祠不由地让人生出一种敬重之情。因为这座庙宇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尊崇的人物之一：诸葛亮。此外，还有28位为蜀国浴血奋战的将士。为什么诸葛亮逝世近2000年还能得到万人拥戴？答案毋庸置疑，就是其军事才能和始终如一的忠诚。

君臣合祀祠宇，后人敬仰

成都武侯祠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惠陵时，它是中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祠庙和最负盛名的诸葛亮、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，也是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。

一进大门，浓荫丛中，矗立着六通石碑，其中最大的一通唐代“蜀汉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”，由唐朝著名宰相裴度撰碑文，书法家柳公绰书写，名匠鲁建刻字，都很精湛，因此被称为三绝碑。碑文对诸葛亮短暂而悲壮的一生，作了重点褒评；竭力赞颂诸葛亮的高风亮节，文治武功，并以此激励唐代的执政者。

碑文特别褒奖诸葛亮的法治思想，马谡因失街亭被诸葛亮依法处斩，临刑，马谡哭着表示自己死而无憾。李严与廖立，两人都是被诸葛亮削职流放的罪人，但他们也自甘服罪。当他们得知诸葛亮病逝，“闻之痛之，或泣或绝”。裴度据史褒评，令人信服。碑文通篇辞句切切，文笔酣畅，使人百读不厌。

步入二门，一座气势雄伟、宽敞的刘备殿呈现眼前。正中有刘备贴金塑像，左侧陪祀的是他的孙子刘禅。为什么儿子刘禅在这里没有位置？据说，由于刘禅昏庸无能，不能守基业，他的像在宋、明两代几次被毁，后来就没有再塑。两侧偏殿，东有关羽父亲和周仓塑像，西有张飞祖孙三代塑像。东、西廊房分别塑有蜀汉文臣、武将坐像各十四尊。

出刘备殿，穿过挂有“武侯祠”匾额的过厅，便到了诸

访成都武侯祠博物馆

本报记者 陆培法



▲诸葛亮像

葛亮殿。殿内正中有诸葛亮头戴纶巾、手持羽扇的贴金塑像，像前的三面铜鼓相传是诸葛亮带兵南征时制作，人称“诸葛鼓”。鼓上有精致的图案花纹，为珍贵的历史文物。

出诸葛亮殿往西可到刘备墓，史称“惠陵”。

公元223年，刘备伐吴失败后，退驻白帝城，4月病逝于永安宫；5月，诸葛亮扶灵柩回成都，8月下葬。惠陵距今1780多年，史书未有被盗的记载。惠陵陵寝建筑由照壁、山门、神道、寝殿、陵墓等组成。惠陵封土高12米，周长180米，为圆形。墓冢四周，围墙环绕，现存砖墙为清道光五年（公元1825年）所修，上有“汉昭烈皇帝之陵”几个大字。

据史书记载，陵中还葬有刘备先后死去的甘夫人、吴夫人两位皇后，是一座合葬墓。甘皇后——后主刘禅之母甘夫人先死，葬于南郡，追谥为皇思夫人。刘备称帝后，下诏将其迁葬于蜀。在迁葬途中，刘备病殁。诸葛亮为此奏请刘禅，认为应将甘夫人与刘备合葬惠陵，刘禅准奏，与刘备同时入葬惠陵。22年后，穆皇后也就是吴夫人逝世，也与刘备合葬惠陵。

忠烈圣地，历代受尊崇

据《宋书·礼志四》载，刘禅景耀六年（263），诏为丞相诸葛亮立庙于沔阳。故沔阳武侯祠始建时代最早。蜀中武侯祠最早建于东晋时期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说：“李雄称王，始为庙于少城内，桓温平蜀，城内独存孔明庙。”蜀中武侯祠始建于李雄据蜀之时（303—334年），最早建于成都“少城”内，即在当时成都城内西部。

桓温（312—373年）为东晋荆州刺史，于永和三年（347）收复蜀地。这是巴蜀史上少有的大激战。在这场大战乱中，成都城内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毁了，仅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独存，这充分说明了诸葛亮在参战双方心目中

的崇高地位。李雄建武侯祠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：它在时间上，上距蜀汉亡国仅四五十年；它是巴蜀大地结束西晋统治后，修建的第一座纪念蜀汉英雄的专祠；它公开表达了蜀人对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英雄的深切怀念，也反映了蜀汉英雄在后人心目中的排位顺序，诸葛亮理所当然的居第一。

在李雄建武侯祠后100余年，南齐又开始了修复汉昭烈庙之举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说：“先主祠在府南八里，惠陵东七十步。齐高帝梦益州有天子鹵簿，诏刺史傅琰（琰）修立而卑小。”齐高帝（479—482年在位）时第一次对惠陵陵园和汉昭烈庙进行了修复。这次修复虽然规模不是很大，但具有重要意义。这次修复后，它又演变为官府承认的、对外开放的名胜古迹景点，游客可以入陵参观凭吊。

杜甫于上元元年（760）来到成都南郊，踏访武侯祠。当时，武侯祠内已古柏森森，由此上推其始迁入年代约在南北朝，上限晚于齐高帝（479—483年在位）修复汉昭烈庙时。

诸葛亮一生功绩建祠源于刘备三顾茅庐；蜀汉帝业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诸葛亮的智慧和忠心耿耿。把他们迁到一起，以良臣伴明君，是对他们“鱼水”君臣的赞许，同时也是欲以诸葛亮的大名来继续辅佐死去的刘备，是儒家文化中君臣观念的强烈体现。武侯祠迁到惠陵、汉昭烈庙旁，3个景点共同构成了一个以三国文化为背景的景区。这是一种强强联合，对丰富这一景区的文化内涵、提高地位、扩大影响等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宋明时期，武侯祠景区调整两次，外延拓展一次。庆历（1041—1048）年间，武侯祠景区发生了南北朝以来的第一次大变。当时蒋堂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。他在修建铜壶阁时，因木材不够用，中途临时决定砍伐蜀先主惠陵陵园和江渎祠中的柏树，又因“不能保有土宇”，下令撤毁刘禅祠，将其材料它用。

明代初年，惠陵、刘禅祠、武侯祠三者合而为一，称昭烈庙。明末，祠庙毁于兵燹。清代康熙十一年（1672年），在祠庙废墟上重建。

1961年，武侯祠被国务院评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84年，成立成都武侯祠博物馆。2008年，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，享有“三国圣地”之美誉。

三国文化，传承生生不息

武侯祠博物馆设有“三国文化陈列”，采用实物、半景模型、灯光特殊处理等创新艺术形式，力图形象再现三国时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生活等方面情况。陈列用色准确、协调，文化氛围浓厚，雅俗共赏。

三国时期，各国均致力于一统天下，战争频繁，军事文化发展显著。“三国鼎立形势图”首先给观众一个时空概念，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示意图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3次著名战例，反映了三国时期兵略谋略得到重大发展。

武士俑、执刀俑、执盾俑、女武士俑、铁蒺藜、铜箭镞、环柄铁刀、铁逆须钉、撞车头、铜弩机、东汉陶马、鏃头、诸

葛鼓等文物，表现了军队及其装备的一般情况。中间小展柜还陈列着一匹成都地区出土的最大的陶马。高约110厘米，长约70厘米，宽约23厘米，昂首仰头，马尾拴结，似扬蹄奔驰，线条粗犷，胸腹肌肉暴突，极富力度，体形高大，体态匀称，造型朴实。

蜀汉提罐俑、提鱼俑、持扇俑、汉代陶井、陶釜、陶碗、陶耳杯和“酿酒”“宴饮”画像砖拓片等则反映了三国蜀汉时期四川地区的饮食活动。“谒见”画像砖拓片及魏晋独坐式坐榻、三国凭几等实物则表现了三国时人们仍席地而坐的起居习俗。名刺、名谒，出土于安徽马鞍山朱然墓，反映了三国时期交往习俗。名刺、名谒即古代的名片，供交往时介绍自己，并有致敬之意。其中名谒既宽且厚，形制、称谓都很庄重，是古代的大名片，用于下级谒见上级。

曹操宗族墓室砖和“三体石经”《上尊号奏》《孔羡碑》《王基碑》等三国碑拓，揭示出三国时期书法的进步。“三体石经”，刻有《尚书》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，以古文、小篆、隶书三种字体书写。《上尊号奏》碑，用笔刚健遒劲，结体端庄秀丽，突破了汉隶常规，铸就了楷书的雏形。

“戏曲聚彩”部分展示京剧三国人物脸谱及京剧关羽、黄忠的戏袍。“民间作品一览”中的诸葛碗、空城计瓷盘、木牛流马模型、民间蜡染、蜀绣制品、剪纸、邮票、木雕、扑克、书签工艺品以及三国酒、张飞牛肉、关公烟等食用消费品，均以三国人物或三国故事为题材，显示了三国文化影响的深远。

“三国文化在港、澳、台海外”则通过各种外文版《三国演义》、台湾人士赠送的《刘氏大宗谱》、武侯祠外景照及关帝庙赠送金丝锦旗、日本孔明偶人形象、泰国刘氏宗亲总会祭祖资料等，侧面反映了三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情况。



▲武侯祠的红墙翠竹